

黃進興：在史學與 文學之間暢遊

● 李懷宇

黃進興，1950年生於台灣，美國哈佛大學歷史學博士。主要研究領域有中國近世思想史、宗教文化史、歷史哲學、比較史學等，代表作有《哈佛瑣記》(1986)、《歷史主義與歷史理論》(1992)、《優入聖域：權力、信仰與正當性》(1994)、《聖賢與聖徒》(2001)、《後現代主義與史學研究》(2006)、《從理學到倫理學：清末民初道德意識的轉化》(2013)、《皇帝、儒生與孔廟》(2014)、《儒教的聖域》(2015)、《學人側影》(2019)，其著作或有英文、日文、韓文等譯本。英文著作有 *Philosophy, Philology, and Politics in Eighteenth-Century China: Li Fu and Lu-Wang School under the Ch'ing* (1995)。2008年，膺選中央研究院院士，現任職中央研究院副院長兼歷史語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員。

2009年夏天，我初次到台北，住進中央研究院學術活動中心。在我和黃進興先生初晤時，黃先生說：「昨晚余英時先生特別打電話給我，問你剛到台北生活是否習慣？」此後，我在台北的那段日子，受到了黃先生無微不至的照顧，給我引薦朋友，帶我品嚐各種美食，為我指點生活迷津。2015年初春，我再赴台北，仍住中研院，依然深受黃先生的教益和照顧。他還專門帶我去拜訪身體已大不如前的李亦園先生，看得出來，李先生和黃先生師生二人情同父子。

我們除了多次在台北暢談，也曾兩次在上海歡聚。第一次是黃先生受邀到復旦大學演講。2012年9月24日，我帶黃先生和吳詠慧夫婦到上海多倫路一遊，一路細數民國時代住在多倫路的文化名人。我猶記得初到上海，曾被復旦大學教授吳中杰夫婦帶去多倫路一家紹興菜館吃飯，便想帶

黃先生夫婦去大快朵頤，想不到那家紹興菜館已然關門，最後我們三個外地人居然在上海吃了一頓北京烤鴨。

第二次見面是在2014年5月，黃先生受邀到華東師範大學閔行校區演講。學校安排了一套房子給黃先生住，黃先生乾脆邀請我也住進那套房子。期間華東師大的茅海建和許紀霖教授分別宴請黃先生，他也帶我同去。5月8日，我約黃先生在套房的客廳裏做了一次訪談。此時距我們在台北的訪談已有五年之久，當時黃先生正擔任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——而後又接任中研院副院長。黃先生說：「這幾年當了所長之後，只有趁晚上和周末夜深人靜時做自己的研究。有時候做起來也比較有效率，因為知道時間不多，做起來就能夠投入，沒有辦法去胡思亂想。」

雖然近年在學術與行政之間奔波，黃先生卻游刃有餘。他笑道：「我也這麼老了，可以且戰且走，也沒有太大的壓力。我不要升等，不要升研究員，也不用升教授，這些對我都已經過去了。所以，我可以比較隨心所欲了。但是有一項工作我可能一輩子都無法完成，就是寫小說。」以前黃先生碰到一位喜歡《哈佛瑣記》的著名作家，一見面就對他說：「你怎麼會做學術？這是在浪費你的精力，你基本上是一個文學家。你把自己的角色搞錯了。」類似的話，黃先生也曾聽其他兩三位小說家講過。他說：「我小時候到高中的志願是要當文學家，但是高中時受到歷史老師的影響，他講的歷史太有趣了，我就去學歷史，出現了很大的轉變。不過對文學的嚮往是永遠存在的，所以我希望在七十歲退休後，就把書全部送給人家，不要再搞學術了。我的理想是：老年要寫一本短篇小說集，然後寫一部長篇小說。我也並非真的要以文學為業，只是我有一些想法，想把它寫出來，但不知道時間和精力會不會允許我這樣做。在未來的五六年，我就要放手一搏。我要在有限的時間內做收尾的工作，關門也要關得漂亮。」

一 孔廟研究

李懷宇：我們曾經於2009年中研院史語所訪談過，那時就着你此前的學術研究進行了比較深入的回顧。在你當上史語所所長以後，研究興趣在哪裏？做了哪些新的學術研究？

黃進興：我最初想研究清末民初道德意識的轉化，但是那時候手頭上有關孔廟的議題還沒完成。另外，杜正勝老所長覺得我對西學比較了解，又給我一個課題，指派我去研究後現代主義史學。那個題目跟我年輕時對史學理論的關懷比較接近，所以做起來也不是太吃力。最重要的是消化一些西方文獻，做若干的梳理，然後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。

另外一項工作，當然是延續以前我研究孔廟文化的基礎，但是在下一個階段，我就嘗試把孔廟當作儒教的聖域。每一個宗教都有神聖的聖域，例如基督教有教堂。儒教在傳統帝國中有獨特的宗教性格，可是在晚清受到以個人信仰為中心的西方基督教衝擊，當時的知識份子覺得儒教應該取法基督教。但是傳統的儒教信仰是一種國家宗教、一種公共宗教，而基督教主要是一種私人宗教。公共宗教跟私人宗教有甚麼不一樣呢？公共宗教不會回應個人的幸福與災難，例如我生病去祈禱，孔廟不會回應；我要發財，它也不會回應。即使考科舉，



黃進興先生（圖片由李懷宇提供）

它也不會回應。它只回應集體的訴求：國泰民安，文運昌隆，所以個人一般不會去拜孔廟。近代的中國知識份子受到了西方宗教的影響，卻不知道這個面向，所以他們判定儒教不是宗教。事實上，儒教是一個宗教，只是它的宗教性格在近代的宗教意識裏隱而不顯。你去問絕大多數的華人，幾乎沒有人會把儒教當成宗教，大家只會說儒家是一種哲學，是一種教育政治學說。如果你說它是宗教，大家心裏就會存疑。

這只是我分析的起始點，這層儒教的宗教面紗該怎麼樣剝掉？民國初年的知識份子：陳獨秀、胡適，甚至第一代新儒家代表熊十力、梁漱溟、馮友蘭，都說儒教不是宗教。但為甚麼第二代新儒家代表唐君毅、牟宗三、徐復觀反過來要說儒教是宗教？唐君毅、牟宗三、徐復觀眾口一詞，難道不知道他們的前輩，即第一代新儒家認為中國是個沒有宗教生活的文明國家？百多年來，不管哲學、文學、歷史都有一個重要議題：儒家或者說儒教是不是宗教？從晚清以來一直有傳教士、學者在辯論，有支持者，有反對者，但是雙方都沒能成功說服對方。在我年輕的時代，四十年前，也知道這個議題，只是我沒有能力去解決這個問題。當我做完孔廟研究，我想這個議題或許可以借孔廟研究來回答，所以我就用了幾個技巧解答了這條問題。有位朋友看了很驚訝，說這百多年來歷久不衰的學術議題，你怎麼輕而易舉地像拳擊一樣技術性擊倒？

李懷宇：在此之前，有沒有經歷過挫折？或者受到學術前輩的啟發和鼓勵？

黃進興：我開始做孔廟研究的起源，不是發自理論的意識，而是要利用孔廟研究解決很多重大的問題。但是，將來若有人寫學術史回顧，或會把我研究

的因果關係顛倒，說我是為了解決「儒教是不是一個宗教」這一知識困惑，找孔廟當證據，把孔廟當作一種聖域。若這樣看，反是所謂典型理性的謬誤。很坦白講，我就是莫名其妙地跑到孔廟去，福至心靈地想到這個題材就開始書寫。所以人家笑說：你怎麼看到孔子木主都要三鞠躬？我說：他是我的衣食父母，給我這個傻瓜一點靈感，讓我去做這個研究。我也講不出為甚麼要做。有些學術發現，事實上是個偶然。

在做孔廟研究的時候，包括我的師長輩，很少支持我。在這三十年，只有張光直院士在口頭上支持過我。我跟他說：我發現孔廟是一個傳統政治跟社會文化力量較勁的地方，是一個政教的聚光點。以前為甚麼沒有人注意到？我們在講道統、政統，這些抽象的觀念都很虛幻。但若把它們放在孔廟中有形的制度上看，那就無所遁形。兩千多年來所謂的政統跟道統，所謂代表中國傳統的政治力量跟文化力量較勁，都可以通過孔廟制度的變遷從而講得很具體、很實在。有一個晚上，我和張光直先生在中研院院區散步，我把這個觀點大略地跟他講，他說：進興，依我的直覺，你抓到一條大魚了；你不要管別人講甚麼，趕快結網把那條魚撈上來。這是我開始做孔廟研究時很重要的鼓勵，人大概總是要獲得適當的鼓勵。

另外一個關注我研究的人就是芝加哥大學的余國藩教授。我想探討孔廟，冥冥之中一頭栽進去，研究到差不多就要出貨了。余國藩先生在一年內就電郵給我三四次，說道：你不要一直以中文書寫，最重要的是把它譯成英文，因為你對話的對象都在西方；你的觀點定會對西方宗教史研究產生衝擊。後來我寫了一封信給他說：我的英文不夠好，我還有新的研究之類。他就很生氣，有一陣子不理我。但他真的很愛護我，也知道我在做甚麼。我把孔廟當作是神聖的聖域，可是以前人們都不這麼看待儒教，大多只談教育、教派、義理，因此他認為我的研究取徑跟別人截然不同。西方宗教學大家伊里亞德(Mircea Eliade)在1960年代說：神聖空間乃是探討宗教性質的要素。但他最終也沒加以實踐。我不知道怎麼就想到這個問題，所以就用這個方式解決了相關的學術問題，而且提供具體個案的操作。我非常感激余先生看得出我所做工作的意義。

二 梁啟超在晚清思想史上的重要性

李懷宇：你的專著《從理學到倫理學》特別探討了梁啟超的「道德革命」及其追隨者。為甚麼過了一百多年，在晚清思想史上梁啟超仍然顯得這麼重要？

黃進興：梁啟超是非常關鍵的人物。某些人說：奇怪了，你怎麼常常以梁啟超當作你開筆的起始點？例如講新史學、倫理，都回到梁啟超，可能是因為梁啟超的文字淺顯易懂？有一天我在想：我跟同事王汎森教授有何不同？王

汎森是研究誰起家的呢？是章太炎，所以他談甚麼東西都會講到章太炎去；我呢，就講到梁啟超。這兩人當然各有長短：從章太炎下手，必須國學基礎比較好。我們都知道章太炎的文章難唸，因為他涉獵傳統學問較廣。梁啟超跟西方來往較密，而我早期的訓練正是偏重在西方學術。《左傳》、《資治通鑑》我都會唸一點，但坦白講，那是「小和尚讀經，有口無心」。在我大約三十歲之前，做學問的整個重心是擺在西學上面的。要處理梁啟超、傅斯年的材料，像我這樣的背景就比較有利，因為我多少知道西學那個部分。梁啟超剛好是當時中西文化的薈萃點，因為他既有舊學功底，又對西學非常狂熱。雖然他介紹康德 (Immanuel Kant) 的文字被王國維批評為膚淺之極、謬誤連篇，但不少人受他影響，包括胡適、蔣廷黻，每一位都講，因為他的文字易懂。在新舊交替的時代，他的影響力非常大。梁啟超動筆快，晚清最有影響力的幾本雜誌都是他辦的，當時大家對新式媒體非常飢渴。梁啟超的影響力遠比章太炎大，但是論對中國傳統思想的深刻思考，當然是章太炎比較重要。

最近我想再回過頭來探討王國維。我年輕的時候想研究王國維，我的博士論文其實要寫王國維，但寫了差不多三個月以後就放棄了。我沒舊學底子，準備不夠。很多大家都知道商、周各朝的問題，我沒有那種舊學的功底，尤其欠缺上古史的知識，可想而知這個研究做不好。現在我想研究年輕時代的王國維，尤其是他受西學影響方面。王國維後來放棄了哲學，寫《人間詞話》，做宋元戲劇史研究，大家都把他這個階段當作是斷裂的階段，但我有點懷疑他受用了西學，嘗試把這些東西延伸到中學來。我了解三十歲以後的王國維，當時他雖然開始轉入舊學問，但仍能推陳出新。這是我三十幾年前不敢做的事情，現在試着重拾舊業，探究一番。我想，做學問就是這樣。年輕一代做學問，有時候會想到一個很好的題目，不過很少去評估目前的學力和準備工作是否足夠，最後常常把好題目做壞掉。譬如，王國維的研究牽涉很多清代經學知識。沒這個背景，怎麼讀懂他的文章？他跟西方哲學的接觸，現在我研究起來就有幾分把握。也許醞釀一段時間，我就會回頭探究一些題目。比如清初的程朱學派，我想把它當成一種建立起來的帝國意識形態，探究這些清朝理學家怎樣圍繞皇帝建立起帝國意識形態。

李懷宇：梁啟超的時代，他所辦的報刊是新式媒體，當時是多麼重要，影響了時代的思潮。張灝先生就講過一個議題，指1895年以後新媒體、新學校、新社團的產生，闡發了新思想，促成整個時代的轉型。

黃進興：推翻清政府、建立民國，這個轉變當時看起來一氣呵成，事實上前面有許多醞釀的階段。在這之前，媒體已經把若干思想從全國的中心點如京城、上海一直往內地散播。稍微有些到城內讀書的人，都開始接觸反清、革命、改良的思想，都在相互激盪。沒有新式媒體，實際上民國是不可能建立的。傳統的知識沒有這種東西，只有在新式的報紙、雜誌出現以後，才

便於全國總動員。當然，不見得能動員每一個人，但重要的是這些較有覺悟的讀書人都會附和新思潮。新式媒體對中國政治、社會改革的影響力，絕對不容忽視。它和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，與政治、社會生活連結在一起，而且它有即時性，不是在講五年、十年以前，而是講一個月、幾天以前的事情，都是發生在你周遭的。官方的邸報，只有官員在看，旁人看不到，也沒有影響力。所以說，梁啟超基本上就是新媒體的佼佼者，把新媒體發揮得淋漓盡致。他為甚麼這麼重要？包括魯迅等人，中間、左右兩翼都說受他的影響。此外，人際網絡也很重要，而梁啟超很容易成為各種團體的核心人物。他不斷辦報，從晚清到民國初年，梁啟超無疑是最重要的人物，他在北洋政府時期還是很關鍵的人物。直到胡適在民國六、七年(1917-1918)回來，這些新的留洋學生在那時才開始取代梁啟超的地位。梁啟超無疑是近代媒體的一個典範。

三 大師雲集的時代

李懷宇：你在哈佛大學留學時，《哈佛瑣記》裏所寫的二十世紀70年代末、80年代初，為甚麼會大師雲集？

黃進興：那個時代人文特別薈萃。以漢學來講，我的老師史華慈(Benjamin I. Schwartz)是一個代表人物。費正清(John K. Fairbank)不是以學問領導，而是以雄心壯志的學術行政能力建立他的漢學帝國。費正清識才，他知道哪些人是好的，這並不容易。舉個具體的例子，當時和史華慈齊名的是列文森(Joseph R. Levenson)。對於留哪一個人在哈佛，爭論很大。以才華、聰明、出眾來講，大家都偏向列文森，但是最後費正清卻決定留下史華慈。後來大家都說留住史華慈是對的，因為史華慈的作風比較具有批判性，他的學術比較厚重，對中西文化有同情的了解。列文森對中國文化很喜歡用一種理性的嘲諷，他基本上對中國文化比較冷淡，比較理性。受史華慈影響的有林毓生、張灝、李歐梵等後來相繼成名的學者，連小輩我都深受他影響。所以，以教育層面來講，史華慈貢獻比較大。現在讀列文森的書的人極少，但唸史華慈作品的還大有人在。

李懷宇：你認為那個大師雲集的時代現在過去了，為甚麼會這樣？

黃進興：每一個時代裏出現的大師，有時候也是有點風雲際會的因素。有文化史、人類學者注意到大師的出現沒有連續性，是屬於一個特定的時代，跟文化息息相關。清末民初為甚麼大師輩出？比如說王國維、陳寅恪這些人都登場了，因為恰好處於傳統中國文化受近代西方文化衝擊的時期。這些人天

資很好，而且聰明，他們舊學沒斷，對新知又有興趣。在舊學沒斷的情況下，新學進來了，他們就利用舊學與新學之間的衝撞做出很多研究來了。他們研究的問題都並不傳統：既不是顧炎武，也不是錢大昕，所以這些學者表現非常突出。接下來就是中國的不幸，從抗戰、國共戰爭到中共建國後的政治運動。四分之三的中研院院士留在中國大陸，但他們能做甚麼呢？本來第一流的人文學者大多沒來台灣，只有胡適晚年來到這裏，傅斯年在這裏一年多就去世了。

中國大陸現在走的路，即使是學術和文化的路都跟當時的台灣很像。台灣有二三十年對西方的學問非常崇拜。有些漢學研究是不錯的——我們不能說它差，但沒有這些人想像中那麼好。現在好像洋人一講話就好得不得了，其實沒有那麼了不起。另外一種情況就是義和團心理，對西方學問全面排斥。但是，台灣學術現狀也不妙，大家的熱情消失了。我們那一代比較珍惜機會，雖然沒有受到大陸那種政治運動的迫害，但事實上生活還是蠻苦的。因為從大陸撤退後，物資也很匱乏，不像上海這幾個大都市。台灣那時候還是比較落後的，大家一般的成長環境都是相當艱難。不過只要不去碰政治，就沒有問題。

像台灣人不太了解大陸為甚麼仇日，因為他們沒有經歷過八年抗戰。像我太太吳詠慧，她的外祖父晚上被日軍帶出去就沒回來了，所以她媽媽痛恨日本人。台灣人在殖民地裏也是二等公民，沒甚麼光榮。可是日本的警察頂多打打人，偶爾有幾人被槍斃或殺掉；日治時代沒有像國民黨「二二八」那種大規模的屠殺，所以相對之下人們不太理解為甚麼台灣人會對日本人比較有好感。因為那時候當個二等公民的日子至少過得去，當醫生在社會有地位，也能賺很多錢。但是國民黨到來後，很多醫生都被槍斃，是時代的悲劇。很多歷史的悲劇，我們要怎麼去理解？台灣跟大陸的關係就應該自然而然地發展，能合就合，不能合就各自繼續維持自己的狀況，強行去做一些動作反而愈形隔閡。

當今我們進入一個沒有大師的時代，這跟治學規模有關係。雖然專家很多，專家裏做得很好的也很多，但就是抓不到大問題。余英時先生可能是還活着的最後一位大師級人物。王汎森、陳弱水和我都號稱是他的學生，可是沒一個人比得上他。他治學的規模非常廣，他不是宋史專家、明史專家、清史專家，而是上下、中外融通的。現在沒有一人有這種本領。他的天資加上師承，一開始就找對了路。他跟隨錢穆，錢穆的舊學規模就已經很宏大。到了哈佛，他跟楊聯陞學習，楊聯陞對一些西方漢學的批判，這一部分對他很有影響。我們中國人總是會全面擁抱自己的老師，發揚師說。但余先生很多論點都跟錢穆是不一樣的，例如錢老師晚年對余先生的「反智論」很不以為然。日本著名漢學家島田虔次親口跟我講：余先生是他見過還活着的最了不起的中國學者。

四 西方的漢學研究

李懷宇：你曾有一本書討論後現代主義與史學研究。後現代主義在西方學界現在發展得如何？

黃進興：現在開始慢慢沒落。現在大家比較講究實在，因為這個理論是觀念跟語言的腦力運動。我那時候寫《後現代主義與史學研究》，事實上是害了我。因為我寫了這本書，院士選舉期間很不順利，人家以為我支持、提倡後現代主義，一些老院士沒看我的書，對我甚為不滿。我原本旨在檢討後現代主義的得失，不是在推銷這個理論。當然這個理論也不能一概抹殺，像它也開發了很多議題，也可以做研究。我們就取其所長，棄其所短，不必全面排斥，現在也逃不了它的影響。這本書唯一的不虞之譽是來自我的老師陶晉生院士，他深怕很少人了解我在做甚麼，於是鼓勵我再用英文把它寫出來。

李懷宇：前一陣子史景遷 (Jonathan D. Spence) 來中國，掀起了很大的風潮，就像明星一樣。他在西方學界的影響力是否真的很大？

黃進興：他在西方的影響力，主要是因為他很會書寫，把中國史的一些案例介紹到西方去，讓西方學界也注意到中國史。這方面他有相當大的貢獻，沒有人可以取代他這個工作。就像美籍華裔學者陳榮捷的重要貢獻也是把中國哲學介紹到西方去，因為他翻譯中國哲學的讀本，把一些基本的概念翻譯出來。史景遷經常上《紐約時報》(The New York Times)，因為若要找個代表人物談後現代中國史學，大家就找史景遷。史景遷會書寫，這是天賦，與後天訓練無關聯，他的老師杜希德 (Denis Twitchett) 教授也這麼認為。就如同我們寫小說，想學契訶夫 (Anton Chekhov) 的短篇小說，該怎麼學？這是東施效顰，書寫天份根本沒辦法訓練。

李懷宇：現在西方漢學研究還興旺嗎？

黃進興：我覺得還可以，但不如以前。以前因為大陸封閉，學術沒有崛起。現在迥然不同，洋人覺得寫的洋書要有個中譯本，並希望中國這文化母體加以肯定。事實上在1960年代的台灣，大家都對西方的漢學馬首是瞻。我在課堂上都聽一些老師輩講，不懂洋文的話，就不懂西方漢學。到了我們那一代的人，國學底子都沒打好，因為大家都被強勢的西方學問所虜獲。他們這些人其實打從心裏看不起錢穆或傳統文化。因為現在中國的舊學又有了契機，尤其透過余英時先生具有創造性的轉化，所以大家都說王國維了不起。在1960年代，大家都覺得王國維那些學者是迂腐至極的人，中國的王國維、陳寅恪算甚麼？根本沒人瞧得起。

余英時先生在這方面起了關鍵的作用，因為他做陳寅恪的研究，大家現在跟着附和說陳寅恪了不起，是大師。其實是余先生讓風氣轉變了。現在誰敢說中國傳統學問不重要？你可以反對它，可以批判它，但沒一個人敢說它不重要，尤其你要做的是中國學問。但是從1980年代開始，台灣成長的這一批學者成熟了，像邢義田、杜正勝。我們都直接到西方取經，就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了，慢慢就對西方學說有反省。但我對現在年輕的學者也不太敢抱以厚望，他們學問做得不夠深入，不夠扎實廣大。現在的出版制度也對做學問有影響。如果要求每一個人寫短小精悍的文章，沒辦法花很大的心血做大學問，那學問就會零碎化。因此，我常常講史語所是可以做出大學問的勝地，學者可以潛心經營大時段的重要議題。現在的學術制度變得量化，情況非常嚴重。台灣也開始在檢討，相信大陸不久後也會檢討。

李懷宇：各種新的思想潮流，產生不同的激盪，因而產生大師，是不是也跟教育制度有很大的關係？

黃進興：有時候會不會產生一個大師，也是不可解的現象。當舊的典範被逼到沒辦法解釋一些我們所面臨的問題，就會逼得大家嘗試去找新的典範。如果舊的認知方式足以應付眼前的問題，大家都會循規蹈矩，何必去找新的方式呢？一定要逼到大家受不了，對於原來想法的弱點已經感到難以忍受了，才會衍生新的突破。所以有時候也要靠機緣。

李懷宇：有一個有意思的現象：西方做學問的學者，寫出來的小說都很妙。我舉兩個例子，一個是寫《達芬奇密碼》(*The Da Vinci Code*)的丹布朗(Dan Brown)，一個是寫《魔戒》(*The Lord of the Rings*)的托爾金(J. R. R. Tolkien)。他們兩個都是學問做得非常精細，然後把學問演化成精彩的小說。

黃進興：其實我這個孔廟研究，基本上就如解開「達芬奇密碼」，旨在解開孔廟的象徵意義。自民國以來學術界就有一種排斥的情緒，不願意去接觸它，不願意去了解它。我就純粹出於對知識的好奇心，所以努力把它解碼。其實，我做的就是解開「達芬奇密碼」的工作。

李懷宇：為甚麼那兩個小說家可以把學問做得那麼好，把學問寫成通俗小說，寫得那麼引人入勝，這也是一個很奇怪的現象？

黃進興：這是藝術。那麼多學問那麼好的人，也沒有幾人能成為小說家，這是可遇不可求的。

李懷宇 廣東澄海人，多年從事知識人的訪問和研究，著有《訪問歷史》、《世界知識公民》、《知人論世》、《訪問時代》等。